

# 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改造(1949—1950)

代雅洁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征粮工作构成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其社会改造的意蕴与效应持续溢出。因应南方新区之征粮困境,华北南下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成功将征粮工作由纯然的财政经济范畴延展至全方位的社会改造领域。随着南方新区征粮工作的不断深入,华北南下干部不仅顺利完成了物力资源的汲取任务,而且最大限度实现了乡村阶级关系的重构、基层权力网络的重组和社会文化观念的重塑。囿于新旧更替、南北差异等因素,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改造中也充溢着政策和实践、国家和社会以及外来和本地等诸种力量的交织互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实践从北方向南方扩展、从老区到新区转移的复杂性与调适性。

**[关键词]**华北南下干部;征粮工作;乡村社会改造;南方新区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4)03-0072-13

新中国成立前后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态势可用“社会改造”<sup>①</sup>一言以蔽之。作为南方新区系统性社会改造工程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华北南下干部显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有许多很好的经验,加上艰苦忠诚的工作精神,迅速地打开了局面,树立起人民政府的威信,成绩确是很巨大的”<sup>②</sup>。征粮工作是华北南下干部“进入新区第一次在农村中大的阶级斗争”<sup>③</sup>,构成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其不独是“解决粮食问题”,亦且要“发动群众协助剿匪,保护农民利益,建立革命秩序,并在征借评议中了解农村情况,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打下农村工作的基础”<sup>④</sup>。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征粮工作被华北南下干部赋予了多重的革命意涵和效应期待,并直接助推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革命化转型。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改造可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学理价值及认知意义,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财经变革与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和观察站。

① 社会改造(SocialReconstruction)是社会改组(SocialOrganization)的一种重要呈现形式,其释义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层面的社会改造主要强调对社会结构本身的改造,而广义范畴的社会改造则是包括政治重建、经济重组、文化重塑及社会重构等在内的整体改造。本文中的社会改造倾向于广义范畴的社会改造,是指华北南下干部对南方新区的经济关系、政治模式、文化形态与社会样貌等展开的全方位、深层次改造,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范围和应有之义。

② 柏原等:《征粮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新湖南报》1949年12月11日,第1版。

③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4页。

④ 《苏振华同志在赣东北区地书专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6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综合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征粮工作,既有著述已然有所关注和讨论<sup>①</sup>,然学界迄今对于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及其社会改造效应的研究却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运用档案、史料汇编、亲历者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从“实践”与“关系”的视域,探讨华北南下干部藉由征粮工作对南方新区乡村社会展开全面改造的历史逻辑、运作机制和溢出效应,考察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之间的关联互动,揭示华北南下干部从北方向南方、从老区到新区的调适性等问题,以期深化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相关研究。

## 一、作为南方新区社会改造首要环节的征粮工作的展开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下半年后,国共双方的攻守之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系统接管和全面改造南方新区的战略构想被中共中央提上了日程,南下工作随之正式启动。在此次干部南下过程中,华北解放区是南下干部选派人数最多、南调任务最重的战略区<sup>②</sup>。经过细致入微、环环相扣的动员、整训等程序,华北解放区下辖冀鲁豫、太行、太岳、冀南、晋中、冀东、冀中及察哈尔等地的干部纷纷踏上南下之路,他们辗转数省,最终到达了南方新区的湖南、贵州、福建、皖南区和赣东北区<sup>③</sup>。

华北南下干部到达这些区域之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变革、全面的更新”<sup>④</sup>。揆诸历史不难发现,华北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一系列“胶着连锁发展”<sup>⑤</sup>的中心工作成为南方新区社会改造的载体与引擎。以重构乡村阶级关系为例,“禁银元是打到〔倒〕地主阶级,征粮也是打到〔倒〕地主阶级,购买公债也是如此”<sup>⑥</sup>。不独重构乡村阶级关系为然,“我们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建立区乡政权等,都是和剿匪、镇反、反霸、土改紧密结合进行的”<sup>⑦</sup>,中心工作亦是华北南下干部重塑基层政治模式的链动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的战事依然持续,“粮食工作做不好,战争将无法顺利前进”<sup>⑧</sup>。与此同时,华北南下干部又接管了众多城镇,“为了解决国家干部和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与促使工厂开工,商店营业,活跃市场流通(当时市场多以粮代币),都必须保证粮食供应”<sup>⑨</sup>。时任贵州炉山县财政科科长冀鲁豫南下干部吴传雍回忆说:“初到新区,真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对

①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张一平:《地租·公粮·农业税——建国初期苏南地区农产品分配关系的重构》,《中国农史》2009年第4期;曹树基等:《“大户加征”:江津县1950年的征粮运动》,《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张杨:《旧田赋与新税制:川西行署一九四九年公粮的征收》,《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这里不再赘述。

②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年10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③ 参见代雅洁:《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剿匪工作研究——以福建、湖南、贵州为例》,《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何志明:《南下干部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④ 孙世昌:《南下后的首战——剿匪》,当代江西史编辑委员会“南下干部”课题组编:《南下》(续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99~100页。

⑤ 葛洪:《南下入湘纪实》,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内部资料1989年印,第50页。

⑥ 《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关于剿匪问题的发言要点》(1950年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剿匪斗争·西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⑦ 南纪舜:《邵武的历程》,王云亭主编:《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回忆录》(长治篇),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⑧ 《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湖南初步开创工作的意见》(1949年7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8页。

⑨ 郭清文:《接管益阳,开展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内部资料2006年印,第184页。

粮、款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既要保证过境部队和地方军政等的供给，又要支援贵阳用粮”<sup>①</sup>。粮食是“我党进入新区后第一个任务”<sup>②</sup>和“与封建势力斗争第一个回合”<sup>③</sup>，所以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遂成为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首要环节。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征粮任务的繁重和征粮时间的紧迫。作为一个高度强调能动性和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认为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有这样的认知不足为奇。然而，除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外，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还面临着粮食短缺、干部匮乏、地富抵抗、匪患严重及环境差异等结构性困境。

长期以来，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粮食产量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增长态势。新中国成立前后，受战争、灾荒等影响，南方新区各地的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粮食短缺成为华北南下干部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困难。太岳南下干部入闽后发现：福建“全省粮食总产量仅56.6亿斤，缺粮的县份占全省县份的1/3”<sup>④</sup>。贵州“全省产粮只有40多亿斤，平均亩产不到200斤。粮食匮乏，导致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sup>⑤</sup>。湖南、皖南区和赣东北区的农业生产条件稍好，但粮食减产比较明显。1949年湖南的滨湖和湘江流域均遭遇水灾，“被灾田亩约三百万亩以上。又由于蒋白匪帮长期的破坏、掠夺、窜扰，直接间接影响粮食收成和损失”<sup>⑥</sup>。1949年夏季，赣东北区“雨量空前，湖水暴涨，圩堤溃决，稻田淹死甚多”<sup>⑦</sup>，粮食产量也大幅下降。

南方新区建政伊始，各级党政机构主要由华北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组成。华北南下干部大都担任领导职务，但数量毕竟有限。冀南南下干部赵吉甫在回忆中写道：湖南华容县解放之初“只有100余名南下干部，开展新区各项工作实感干部力量不足”<sup>⑧</sup>。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匮乏对于征粮工作影响甚大，因为干部数量“远远不敷分配使用。要完成这项征粮支前任务，困难真是大得很”<sup>⑨</sup>。时任湖南长沙地委书记的晋中南下干部武光也指出：“以这样微小的干部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艰巨的任务，确实是很困难的。”<sup>⑩</sup>由此略见，培养和提拔新干部是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时，南方新区各地的征粮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地富势必以各种形式进行抵抗和破坏。太岳南下干部师仁忠总结过福建建瓯县地富抵抗征粮的各类手段：“一是逃避不见，二是借

① 吴传雍：《乘胜进炉山，忙于征粮和接管》，中共荏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荏(博)平南下北上干部》，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② 《华中局关于新区工作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49年9月1日)，中共荏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荏(博)平南下北上干部》，第479页。

③ 《中共中央华中局致林、谭电：转湖南省委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9年11月29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712页。

④ 《扎根闽东》，中共济源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济源干部南下福建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⑤ 边裕鲲等：《贵州省解放初期的财政接管及建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⑥ 《湖南省临时政府关于开展生产备荒的指示》，《新湖南报》1950年1月24日，第1版。

⑦ 《赣东北区党委关于目前几项工作的指示》(1949年7月12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内部资料1991年印，第137页。

⑧ 赵吉甫：《从南宫南下到华容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内部资料2006年印，第167页。

⑨ 肖劲光：《和平解放长沙与湖南军区的组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2页。

⑩ 《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第481页。

口佃户不交租,无粮可交,三是胁迫农民为地主出假证明,四是装穷叫苦,要求献田不交粮,五是煽动为我征粮的保甲长消极怠工。”<sup>①</sup>直接抵抗一般会遭致不同程度的惩处,所以多数地富更倾向于选择相对隐蔽的策略来破坏征粮工作。晋中南下干部郭祯观察说:湖南耒阳县的地富“发现他们用硬抗的办法不起作用,就改变花招,用软的办法抵抗。四区普桥乡有个大地主邵寿南,他和他的媳妇串通,施用美人计来妄图破坏我们的支前任务”<sup>②</sup>。直接抵抗和隐蔽抗拒都增加了征粮工作的社会成本,南下入黔的贵州省政府认为,征粮工作之所以不能顺利进行的重要致因就是“农村中恶霸分子和地主中少数不守法不明大义分子,对缴纳公粮的顽抗与拖延”<sup>③</sup>。

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开展之初,“因地方武装仍未确定”<sup>④</sup>,各地匪患异常严重。在湖南临澧县,“数路股匪结合当地散匪,总计不下数百人,日夜活动抢劫杀人破坏征粮”<sup>⑤</sup>。匪患问题极大破坏了南方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致使征粮工作无法正常开展。1950年春节刚过,贵州发生了大规模匪乱,直至5月间全省“仍有二十二个县不能控制,大大影响征粮工作”<sup>⑥</sup>。不惟如此,匪患问题也加大了民众的交粮顾虑。在福建宁德县,“由于匪特活动猖獗,社会环境恶劣,群众尚有‘变天’的忧虑,不敢靠近党和人民政府。地富、恶霸对征粮软拖暗抗。一般群众对交纳公粮也持观望态度”<sup>⑦</sup>。匪患及其所引发的征粮困境由此可窥一斑。

不同于北方老区,党和政府在南方新区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民众之间也存有一定距离。时任福建福清县二区组织委员的太岳南下干部郭怀玉坦诚地谈到:“由于我们几个主干都是北方人,对闽南话一句也听不懂,再加上海口区刚刚解放,仍实行的是保甲制,和我们沁水老解放区的情况大不相同。不少群众心里对国民党反攻大陆还存在恐惧感,思想觉悟还不高,给我们开展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sup>⑧</sup>北方老区与南方新区的环境差异不仅表现为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而且在阶级结构、经济形态等方面亦有体现。北方老区的阶级结构以自耕农为主体,自耕农历来有向政府交粮纳税的传统,因此征粮工作的开展相对容易。南方新区租佃制度盛行,佃农数量庞大,依循既往惯习,佃农无须向政府直接缴纳赋税,征粮对象一旦扩至他们身上,势必引发强烈反弹。以晋中南下干部为主体的衡阳市政府总结说:“根据习惯佃农以往未直接交粮,这次交粮因〔引〕起不满,因而瞒田瞒产。”<sup>⑨</sup>在北方老区,地主和农民均生活在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之中,兼具自然属性与行政范畴的村庄成为征粮工作的基本单元。南方新区城镇工商业发达,阶级状况也更为复杂,尤其是地主兼营工商业者数量众多。地主兼营工商业者多居住在城镇,土地与居地的分离、乡村与城镇的隔阂进一步加大了征粮工作的难度。1949年7月,以冀南南下干部为骨干的常德地委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地主多在城内住,他们收

① 师仁忠:《一九四九年的征粮工作》,中共建瓯县委党史委编:《首批派瓯南下干部史料座谈专辑》,内部资料1988年印,第14页。

② 郭祯:《为了永久的纪念》,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第131页。

③ 《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内部资料2007年印,第237页。

④ 《湖南军区给中南军区的电报》(1949年8月23日),刘唐益主编:《湖南剿匪》,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⑤ 《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通报(第五号)》(1950年1月13日),常德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南下干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内部资料2013年印,第157页。

⑥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⑦ 李文魁:《接管宁德财政工作片断》,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回望南征——纪念长江支队高平干部南下七十周年》,内部资料2019年印,第82页。

⑧ 郭怀玉:《留在心中的岁月》,贾志军主编:《热血献闽疆》,科教文图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⑨ 《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〇年征粮工作的总结》,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租之后，马上出卖粮食，换成硬币到城内享受，很少存现粮，如不抓紧，以后再向其征粮，便增加困难”<sup>①</sup>。这些问题均是华北南下干部在北方老区的征粮工作中从未遇到过的困难，隐伏着调适北方老区工作经验和适应南方新区客观情状的必要性。

前述结构性困境都对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提出了较大挑战，征粮工作显然应超越纯然的财政经济范畴而延展至全方位的社会改造领域。粮食短缺要求华北南下干部实施公平合理的征粮政策以及进行民主评议等工作，干部匮乏需要华北南下干部培养新干部和召开农代会，地富抵抗急需华北南下干部对其展开相应斗争，匪患严重需要华北南下干部组建地方武装以重建基层军事秩序，环境差异则要求华北南下干部对南方新区的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动员。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既是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之因应，同时又是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之效应，展现出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之间的协同演进和交织互动。

## 二、华北南下干部在征粮工作中的社会改造实践

为政在人，干部向来在政治力量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严密、效率优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而言，各级干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亦是如此，肩负主要领导责任、拥有丰富工作经历的华北南下干部发挥了主导作用。湖南临湘县“有老干部六十二名，参加征粮工作的五十四名，即为原干部百分之八十七，带领新干部，进行工作，使工作的各个角落，普遍有了力量”<sup>②</sup>。征粮工作的社会改造意蕴和效应进一步凸显了华北南下干部的独特作用，因为“他们会与农民搞好的，这是本质上的问题”<sup>③</sup>。面对南方新区的征粮困境，华北南下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以最大的注意去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使之既能保证军需，又能不致造成混乱影响民生”<sup>④</sup>，有效开展了政策调适、培养新干部、召开农代会、宣传动员、民主评议、斗争地富及组建地武等一系列工作。这一系列工作不仅形成了征粮工作的整体链条，而且构成了乡村社会改造的实践内容，进而引动了南方新区阶级关系、权力构造、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等的整体变动。

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征粮主要是向地主富农要粮”<sup>⑤</sup>，这明显“研究与参照了老区政策及办法”<sup>⑥</sup>，成为华北南下干部调整阶级关系、改造社会结构的重要实践形式。湖南常德地区的农民就惊奇地发现：“这回借粮和以前是整整翻个了”<sup>⑦</sup>。当然，合理负担只是一个基本原则，华北南下干部亦参酌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具体的征收办法进行了调适。冀鲁豫南下干部孙汉章回忆说：贵州贵阳地区各县的征粮方法“不尽一致。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按旧政府原来布置的数字进行征借；再一种是参考旧政府原来布置的数字，我们确定征借任务数量，责成乡保长完成；第三种是建立支前委员会，由支前委员会分配任务，我们干部下去督促

① 《常德地委会“给省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9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245页。

② 王德广：《临湘县征粮工作进度较快的主要关键》，《新湖南报》1949年11月28日，第2版。

③ 《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发言》，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D-65-10。

④ 《对开始进入皖南工作的几点意见》（1949年7月1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2-2。

⑤ 李庆震：《织金县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345页。

⑥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825页。

⑦ 《一面剿匪一面借粮，训练干部铺开工作，常德分区初步总结筹粮经验》，《新湖南报》1949年9月20日，第1版。

检查；第四种是根据产粮具体情况，有重点地征借”<sup>①</sup>。华北南下干部初到南方新区，对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而征粮任务又十分紧迫，所以其征粮办法必须灵活变通。

灵活变通的征粮办法很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的特殊情状，但有时却不得不面对问题的另一面，即征粮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和无序。太岳南下干部温附山在回忆中记录了福建闽侯地区的征粮情况：“筹借办法各搞各的，有的按户募集，有的按田亩推派。筹粮的名义也不同，有的是游击队，有的是支前办事处，有的是军管会，有的是临时人民政府”<sup>②</sup>。征粮过程中的混乱现象和无序局面不仅会助长“老区变象〔相〕土改思想”<sup>③</sup>，造成由征粮而引发的社会改造过于激越，而且极易扩大华北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分歧，“如广丰在征借中，江北干部认为地主叫苦是手段，而本地干部认为是要的太重”<sup>④</sup>。这些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兹后随着《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出台，依率计征和累进征收逐渐成为南方新区各地征粮的统一办法。例如，贵州赤水县“1949年的公粮征收，是参照国民党政府的田粮册子，分任务到各区乡征收的”，“1950年的公粮征收，改变了办法，按中央规定的统一税率征收，设有一个起征点，按等级累进，按率计征后地主加二成，自耕农不加，佃农减二成，政策界限非常明确”<sup>⑤</sup>。依率计征和累进征收更加注重征粮工作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其调整阶级关系进而改造社会结构的效用亦更为持久和深刻。

征粮工作具有极强的战略性与策略性，对于干部的数量、素质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遑论培养新干部本就是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题中应有之义。华北南下干部在征粮工作中培养新干部的形式多种多样，这其中尤以训练班最为常见。1949年9月，南下入湘的湖南省委明确要求“各县必须大力抓紧，吸收知识分子，举办地方党员短期训练班，准备征粮干部”<sup>⑥</sup>。时任贵州赤水县县长的冀鲁豫南下干部肖光也回忆说：“1950年2月下旬，我们在赤水中学开办了征粮训练班，约100人参加，一部分是乡公所人员，一部分是招收的当地初高中学生”；“1950年6月，又开办了第二期征粮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100余人”<sup>⑦</sup>。

通过训练班等形式，华北南下干部“培养了大批新干部结合征粮”<sup>⑧</sup>。1949年12月，湖南邵阳地区“在征粮工作中已培养了新干部三千零九十名”<sup>⑨</sup>。晋中南下干部武光也报告说：长沙地区在1949年的秋征中“培养了5500多个新干部”<sup>⑩</sup>。新干部的培养为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与社会改造提供了组织基础，他们纷纷在华北南下干部的领导下“组成工作队下乡开展征粮工作”<sup>⑪</sup>。

① 孙汉章：《贵阳地区的解放及初期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221页。

② 温附山：《往事千秋·温附山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③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825页。

④ 上饶地委组织部：《上饶地委会师工作报告》（1949年6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17页。

⑤ 肖光：《赤水县的接管及剿匪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294页。

⑥ 《湖南省委关于打开新区工作局面问题致常德地委指示》（1949年9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199页。

⑦ 肖光：《赤水县的接管及剿匪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293页。

⑧ 《解放以来湖南工作概况》，《新湖南报》1950年1月1日，第7版。

⑨ 《纠正忽视培养新干部后工作迅速展开》，《新湖南报》1949年12月23日，第2版。

⑩ 《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第477页。

⑪ 刘昌：《会同地区剿匪经过》，中共怀化地委党史办编：《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这些新干部成为“南下同志联系群众的桥梁”<sup>①</sup>，并逐步打破了历来横亘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掮客”和“经纪体制”<sup>②</sup>，南方新区的基层精英生成机制和乡村权力运作方式悄然改变。

南方新区接管建政之初，各界代表会议是华北南下干部团结、联系和发动民众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征粮工作中，“农代会是新区团结发动群众最好的形式”<sup>③</sup>，对于“进行阶级教育，挖底算账，教育群众进行斗争，贯彻政策，击破顽抗及破坏份子抵抗极为重要”<sup>④</sup>。鉴于农代会在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中的独特作用，以华北南下干部为核心的各级党政机构普遍领导了农代会的召开。晋中南下干部张耀民回忆说：湖南湘潭县的5个区“都召开了400~1000人代表大会”<sup>⑤</sup>。召开农代会，代表的选举最为重要。南方新区各地农代会代表的选举条件明显向广大农民倾斜，贫农、佃农和中农纷纷当选，“这真是叫穷人当家了”<sup>⑥</sup>。

农代会的召开对于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助益颇大。在湖南湘潭县，“易俗七保代表回去后就造了田亩清册，揭发了地主的瞒田，二保被雇去的代表回去后，也讲出要地主出粮的道理，地主恨得咬牙说：‘这些做零工子的也发起威来了’”<sup>⑦</sup>。以冀鲁豫南下干部为骨干的贵州省委工作团在其工作总结中也谈到：贵筑县白云区农代会的成绩很大，“代表们都积极的宣传政策，组织积极分子形成力量，不但自己带头交粮，并积极的催粮。查黑地，替群众办许多好事情，有的村农代表代替了保甲长。群众有的事情找代表不找保甲长”<sup>⑧</sup>。农代会的召开有助于解决征粮工作中的黑地瞒产、中间耗损等经济问题，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旧权势转移和治理机制嬗替的政治过程。

依循北方老区的实践经验，宣传动员构成征粮工作与社会改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南下入湘之初，湖南省委就反复强调：“必须广泛展开征借粮食政策与合理负担政策的宣传工作，进行阶级教育……同时，也使他们懂得，我党的负担政策是完全公平合理的，如有转稼〔嫁〕，那是封建势力与旧保甲的罪恶，从而也可以动员群众向封建势力作一定的斗争”<sup>⑨</sup>。征粮工作全面展开后，举凡会议、积极分子等在北方老区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方式均被华北南下干部所运用。会议具有传播力强、覆盖面大等优势，能够形成共识和造成威慑，特别“是适合这种时间短、任务大、群众基础不好，又要贯彻政策的工作需要的”<sup>⑩</sup>。1949年12月，时任湖南常德县县长的冀南南下干部张勇总结了该县通过会议方式进行宣传动员的具体流程：“以保或片保召开干部会（评

① 葛洪：《南下入湘纪实》，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第55页。

② 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8~91页；〔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7页。

③ 《苏振华同志在贵州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8月3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第185页。

④ 《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824页。

⑤ 张耀民：《回忆湘潭接管建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卷，内部资料2005年印，第186页。

⑥ 魏子文：《津市第六保征粮工作经验总结》（1950年11月16日），常德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南下干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第183页。

⑦ 《从湘潭的征粮工作中研究农民代表会》，《新湖南报》1950年1月12日，第2版。

⑧ 《省委工作团五个月来的工作总结》（1950年5月14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第133页。

⑨ 《中共湖南省委对于湖南初步开创工作的意见》（1949年7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第459页。

⑩ 《岳阳征粮工作中有关发动群众的几个问题》，《新湖南报》1949年12月1日，第2版。

议员,征防委员,代表,保甲长,积极份子(分子)和社会人士)的扩大会议,和群众大会,宣传目前胜利形势和我党的征粮政策,揭发地主的抵抗破坏和拖延”<sup>①</sup>。作为一种蕴含能动性、先进性等共产主义运动特质的宣传动员方式,华北南下干部十分注重积极分子在征粮工作中的示范效能和推动作用。在湖南长沙地区,晋中南下干部即“动员开明地主、绅士和农民积极分子带头,并实行表扬奖励政策”<sup>②</sup>。针对一些不适用于南方新区实际状况的宣传动员方法,华北南下干部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通和调适。复以会议为例,“北方农民居住很集中,说要开会,一张罗,刹时就到齐了”,但南方新区的民众居住较为分散,华北南下干部转而“改用多开小型座谈会,少开大会的办法”<sup>③</sup>。

经过反复的宣传动员,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民众不仅认识到征粮工作的巨大意义,而且体悟到新旧政权的真正区别,其思想觉悟与组织水平均显著提升。贵州黄平县的资料显示:“通过宣传和教育、发动,绝大部分能主动上交。”<sup>④</sup>这并非贵州一隅之现象,湖南汉寿县六区的新中乡和全固乡“经过很好的宣传动员后,积极分子带动群众踊跃的报出黑田两千多亩”<sup>⑤</sup>。时任溆浦县城关镇镇长的南下干部东羽发现,“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极大推进了征粮工作,“群众态度也起了变化,由疏远我们到亲近我们”<sup>⑥</sup>。华北南下干部藉由征粮工作进行乡村社会改造的威力和伟力彰明较著。

民主评议关乎负担的分配与利益的调整,是征粮工作中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造实践。随着培养新干部、召开农代会等征粮实践的完成,华北南下干部参酌北方老区的征粮经验,大抵采取了两种民主评议的方法:“一是按照保甲召集各户开会,自报公议,二是召集地主富农自报互评,经农民代表审查。”<sup>⑦</sup>征粮工作的“重要关键在于评议会,评议员的好坏又直接影响了工作的进展”<sup>⑧</sup>。在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评议委员会主要是通过选举和延聘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冀南南下干部魏子文回忆湖南津市六保评议委员会产生的具体流程及其职责时称:“每甲提出3人为保的代表,然后再从3人中选出1人为保评委委员,另外再聘请两名知识分子组成保评委会。经过选举,贫农路安润为保评委会主任,保干事刘铁山为副主任。从此,津市六保的借粮、征粮工作便依靠这个评委会的骨干,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清查黑瞒、布置任务、进行评议、三榜定案、送粮入库。”<sup>⑨</sup>

民主评议的流程公开透明,评议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农民手中,其职能范围亦展现出“运动”的取向与趋向,广大农民缴粮纳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遂大幅提升。时任贵州江口县财粮科干部的冀鲁豫南下干部刘光谦指出:民主评议“真正地做到了让老百姓知道,政策是公开的,负担是合理的,因而他们交纳公粮,完全是自觉的”<sup>⑩</sup>。湖南平江县的农民也称赞说:“过去是保长和

① 《常(德)县召开区书、长联席会议,张县长总结征粮工作》(1949年12月21日),常德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南下干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第151页。

② 武光:《下江南——忆1949年从华北南下长沙地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卷,第73页。

③ 柏原等:《征粮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新湖南报》1949年12月11日,第1版。

④ 石有恒整理:《解放黄平,接管政权》,中共芷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芷(博)平南下北上干部》,第127页。

⑤ 《注意宣传政策教育群众,汉寿秋征中挤出黑田四万多亩》,《新湖南报》1950年10月15日,第2版。

⑥ 东羽:《从北京到溆浦》,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下入怀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5年印,第48页。

⑦ 王祝光:《常德专区解放初期的开创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第198页。

⑧ 《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〇年征粮工作的总结》,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85页。

⑨ 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30页。

⑩ 刘光谦:《谈谈解放初期征粮与剿匪工作》,江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口县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印,第41页。

少数有势力的人一手指定平均摊派，今年是民主评议了，这个办法真好”<sup>①</sup>。

地富抵抗是华北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基本困难之一，在民主评议的同时“必须发动群众，给以坚决的打击，用反瞒田、反谣言、反破坏等办法，克服这些坏分子的抵抗，这是征粮中的主要问题”<sup>②</sup>。华北南下干部“在家经过土改，发动群众，斗争地主都有经验”<sup>③</sup>。时任湖南长沙专署副专员的晋中南下干部樊雨生曾总结过斗争地富的多种方法：“一，晓以大义，教育地主及富农，执行政策，快交公粮，揭发抵制、拖延、转嫁负担等行为；二，大势所趋，不乏交粮的开明人士，用以推动其他地主交粮；三，对顽抗破坏、瞒田不报、抵制征粮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sup>④</sup>此为的论。

必要的斗争往往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成为南方新区征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造内容。太岳南下干部王怀镐等谈到：福建闽侯县的“反动地主千方百计的和人民政权为敌，对抗人民政权的借粮……人民政权先后给予了不同的打击，保证了借粮工作的顺利进行”<sup>⑤</sup>。以晋中南下干部为主体的湖南衡阳市委也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而打垮地主阶级的统治工作，挤出大量的黑田，仅八区九保就挤出黑田三百余亩，七区八保仅五户就挤出黑田百余亩，其他区均在一二百亩以上，并进一步发扬了民主，过去受地主阶级压榨的不敢说话，老实农民经过教育后展开了说理斗争”<sup>⑥</sup>。“征粮工作是我们干部与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sup>⑦</sup>，直接推动了南方新区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重构。

组建地武也是保证南方新区征粮工作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不掌握武装，就没有拳头，没法工作，就站不住脚”<sup>⑧</sup>。以冀东南下干部为主体的湖南邵阳地委讲得很明白：“应积极抓紧建立与发展县区武装，成为坚持斗争的有力拳头，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恶化情况，坚持工作，完成征粮支前等重要任务”<sup>⑨</sup>。征粮工作全面开始后，“各地南下干部积极组织地方武装”<sup>⑩</sup>，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县、区地方人民武装（县大队、区小队）和农村民兵组织”为代表的地方武装体系<sup>⑪</sup>。赣东北区就是以“南下支队武装为骨干，以坚持在赣东北活动的游击队为基础，通过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带动大批群众参军，迅速建立起各县大队和区中队”<sup>⑫</sup>。

地方武装的组建对于肃清匪患进而保障征粮工作的完成作用甚大，这一点在南方新区各地的文献资料中均有体现。湖南新化县三区“原是土匪情况较严重的地区，由于抓紧建立了区干队，区干部即协助征粮工作而进行了剿匪，因此征粮任务是该县进度最快的一个区”<sup>⑬</sup>。不惟如此，地方武装的组建还改变了南方新区的基层军事秩序和乡村权力关系。冀鲁豫南下干部陈凤梧回忆

① 《平江县征粮工作进入分配评议阶段》，《新湖南报》1949年10月19日，第2版。

② 《衡阳地委总结安仁等县征粮工作》，《新湖南报》1949年11月10日，第2版。

③ 李玉春：《回忆晃县剿匪》，中共新晃县委党史联络组等编：《新晃南下干部回忆录》，内部资料2010年印，第40页。

④ 樊雨生：《接受经验教训 完成征粮任务》，《新湖南报》1949年10月18日，第2版。

⑤ 王怀镐等：《长江支队四大队三中队接管闽侯建立闽侯人民政权纪实》，翼城县史志档案馆编：《翼城干部南下福建实录》，内部资料1999年印，第82页。

⑥ 《中共衡阳市委关于衡阳市征收工作初步检查的报告》（1949年11月30日），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69页。

⑦ 王宜捷：《南下日记（1948—1949年）》，内部资料1998年印，第318页。

⑧ 《关于进入邵阳地区的初期工作布置——夏如爱同志在邵阳地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9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323页。

⑨ 《中共邵阳地委关于目前工作的紧急指示》（1949年11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第43页。

⑩ 王继平：《我的南下经历》，政协平定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平定县南下干部纪实》，内部资料2017年印，第111页。

⑪ 庞顺诚：《难以忘却的五个月》，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

⑫ 《赣东北地区剿匪简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综合卷》，第196页。

⑬ 《征粮与剿匪建立武装分不开》，《新湖南报》1949年12月23日，第2版。

说：贵州都匀县“在清匪、征借粮食的同时，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由积极分子和贫雇农青年参加的武装队伍，各区队均发展到20余人，县大队发展到100多人。当时我们提出了‘枪换肩’的口号，即把地主等反动势力的枪强行借出来，交给已经组织起来的民兵”<sup>①</sup>。土匪、地主等控制乡村社会权势的局面陡然崩解，党和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管控能力和治理绩效明显增强。

### 三、南方新区征粮工作的乡村社会改造效应

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开展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强调这“不单是财经工作而是农村工作的开始”<sup>②</sup>。随着征粮工作从财政经济范畴向社会改造领域的延展，征粮工作的意义已然溢出和超越了征粮本身，其不仅成功完成了对物力资源的汲取任务，而且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阶级关系的重构、权力网络的重组及文化观念的重塑等社会改造目标，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

征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地主阶级所进行的一场斗争”<sup>③</sup>，削弱地主阶级的力量成为以合理负担为原则的征粮政策的基本要求。时任湖南长沙地委书记的晋中南下干部武光讲到：“合理负担斗争就是发动群众削弱封建的过程。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从经济上去削弱封建阶级”<sup>④</sup>。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调查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湖南湘阴县，征粮“负担面占户数百分之二八至百分之四十，有些地主竟负担到产量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sup>⑤</sup>。贵州开阳县新寨村地主的负担率也占到总收入的59.95%<sup>⑥</sup>。在这样的征粮政策下，整个地主阶级被明显削弱，有些地主甚至遭致毁灭性打击，以致“普遍要求提早土改”<sup>⑦</sup>。由税制改革所引致的“静悄悄的革命”<sup>⑧</sup>模式被华北南下干部嵌入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实践之中，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逐渐形成。

一面是地主阶级的削弱，另一面则是农民阶级的获益。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彻底“改变了国民党时期，不论粮食多少，够不够吃，一律按地亩摊的不合理的办法”<sup>⑨</sup>，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的冀鲁豫南下干部边裕鲲等回忆说，贵州解放初期，中农的负担为总收入的10%上下，贫农的负担仅为总收入的7%左右<sup>⑩</sup>。负担的降低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忱，为农家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上升创造了前提条件。在跟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不少农民还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经济“果实”。晋中南下干部陈德邻在湖南永顺县文昌乡领导征粮工作时发动

① 陈凤梧等：《都匀县的解放及初期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405页。

② 《工作报告》（1950年1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第78页。

③ 李哲：《从冀南南下到沅江县的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第96页。

④ 《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1949年12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第478页。

⑤ 《中共中央华中局致林、谭电：转湖南省委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9年11月29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第713页。

⑥ 西南财政部农业税处：《两年来西南农业税调查研究工作及会后意见》（195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582页。

⑦ 《转发一旬财经要报的批语》（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⑧ [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⑨ 王宜捷：《南下日记（1948—1949年）》，内部资料1998年印，第252页。

⑩ 边裕鲲等：《贵州省解放初期的财政接管及建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153页。

农民进行了反黑地斗争，地主补交粮食35万斤之多，这些补征的粮食大部被“分发给缺粮食的穷人”<sup>①</sup>。经济利益的获取进一步改变着乡村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阶级身份日益成为南方新区乡村社会中的一种分野与标识。

征粮工作“不只是重要的经济任务，同时是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sup>②</sup>。征粮工作完成后，南方新区的基层政治构造也发生了深刻变动，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冀鲁豫南下干部在赣东北区的征粮工作中“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据上饶、贵溪、浮梁、鄱阳4个地区不完全统计，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37882人，妇女会员2672人”<sup>③</sup>。新中国成立前后，群众组织在南方新区的基层权力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党和政府开始能和群众建立起直接联系”<sup>④</sup>，群众直接介入乡村治理体系。由此，“南下干部和当地干群很快就打成一片，亲如一家”<sup>⑤</sup>，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长期疏离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尽管华北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初期采取了暂时利用旧保甲的策略，但旧保甲“往日的威风，今日不敢再施展了”<sup>⑥</sup>。在强制性的社会改造下，“昔日最基层的封建统治保甲长以及骑在群众头上的恶霸知识分子们，低下了头，再不敢欺压群众了”<sup>⑦</sup>。及至征粮工作后期，“基本群众敢出来说话，农村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地方直接“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人民的乡村政权”<sup>⑧</sup>。晋中南下干部郝二芳回忆说：随着征粮工作的结束，湖南耒阳县六区就“取消了保甲长，选举成立了新的乡政府”<sup>⑨</sup>。“基层政权，这是人民掌握政权的根本问题”<sup>⑩</sup>，从封建的保甲制度到人民的乡村政权，党和政府的权力下探与民主建政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经过征粮工作，旧保甲长、土匪恶霸和地主豪绅等传统政治精英逐渐式微，而以农民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为代表的新型政治精英则迅速崛起。“物色积极分子，选拔乡村干部”本为华北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要项之一<sup>⑪</sup>，征粮工作开始后，这一要项旋即转化为现实，“劳动人民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为新政权建设打下了基础”<sup>⑫</sup>。冀南南下干部孙景华谈到：湖南邵阳地区从“征粮剿匪中的农民积极分子中挑选委派乡长，以取代原国民党乡长”<sup>⑬</sup>。一大批得到党和政府直接授权的贫苦农民登上了村庄政治的舞台，其权力来源、构成要素等均发生了革命化转向。

不独权力网络的建构与政治精英的继替为然，南方新区基层政治构造的变动还包含着治理机

① 李泰来：《陈德邻同志的传奇人生》，吕梁市政协学习宣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吕梁干部南下·晋中团（一）》，内部资料2017年印，第310页。

② 《湘首届财粮会议结束，决定秋征具体办法，确立财政工作制度》，《新湖南报》1949年10月10日，第1版。

③ 徐运北：《解放赣东北》，中共荏平县党史研究室编：《荏（博）平南下北上干部》，第115页。

④ 王怀镐等：《长江支队四大队三中队接管闽侯建立闽侯人民政权纪实》，翼城县史志档案馆编：《翼城干部南下福建实录》，内部资料1999年印，第81页。

⑤ 李天瑞等：《在党的培育下茁壮成长——记高平县南下干部》，政协山西省高平市委员会等编：《南下纪实》，内部资料2011年印，第53页。

⑥ 王宜捷：《南下日记（1948—1949年）》，内部资料1998年印，第249页。

⑦ 《衡阳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关于入城以来七个月的工作检查》（1950年5月21日），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348页。

⑧ 李满全：《南下前后》，忻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忻州文史——南下干部资料专辑（之一）》（总第25辑），内部资料2013年印，第247页。

⑨ 郝二芳：《南下来阳的回顾》，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编：《南下集》，第158页。

⑩ 《中共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毛远耀作解放一年衡阳市政工作报告》（1950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195页。

⑪ 李庆震：《织金县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回忆卷》，第345页。

⑫ 东羽：《从北京到淑浦》，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下入怀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5年印，第49页。

⑬ 孙景华：《邵阳地区建国初期的有关工作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第212页。

制和运作方式的改变。北方老区的治理机制和运作方式向以健全、高效、民主和廉洁而著称,藉由征粮工作,这样的治理机制和运作方式亦被华北南下干部植入南方新区。时任贵州炉山县委书记的冀鲁豫南下干部单志远回忆在征粮工作中所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的治理框架时表示:“村农会设主席、副主席及生产、治安、调解、青年、妇女等委员,一般7~9人;组设组长、副组长。村农协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及治安小组。‘一切权力归农会’,上至反封建斗争,下至邻里纠纷,大小事情概由农会管理。”<sup>①</sup>农民协会的治理框架健全且高效,已经完全溢出了传统时代以赋税和诉讼为基本事项的权属范围。同时,南方新区的基层政权又是民主建政的产物,贵州贵筑县白云区的民众观察说:“过去拨粮要拿包袱(送礼),要请吃饭,还不能解决。今天同志们帮我们办事,茶都不吃一口,人民政府的同志就是好。”<sup>②</sup>对于一个以群众路线为根本工作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毋宁说是极大的褒奖。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呈现形式,思想文化形态随着阶级关系与权力基础的变动而移易。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社会改造的目标中本身也暗含着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即肃清反动文化与构建革命文化<sup>③</sup>。征粮工作完成后,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民众的思想认识、政治觉悟等明显提高。在湖南衡山县,“许多从华北老解放区去的干部,他们一致说:衡山的农民觉悟快”<sup>④</sup>。语言的转向更能够说明这一变化,各种新名词、新术语出现和使用的频次越来越多。太行南下干部武彦荣曾领导过福建南平县西芹镇的征粮工作,征粮的口号有“早交粮,交好粮,争取当模范”“早交粮,早分田,彻底闹翻身”等<sup>⑤</sup>。以晋中南下干部为骨干的衡阳市委报告过这样一个征粮情景:“七区一个贫农找到区长诚恳的说道:‘你们来了可该我们翻身了,今后一天要比一天好了。’八区八、九保的贫苦农民说:‘这回办的好,这才叫合法’”<sup>⑥</sup>。“模范”“翻身”和“合法”等极具革命意涵的新话语已然融入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党和政府逐步确立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领导权。

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中,华北南下干部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冀中南下干部吕纯在回忆中详细记录了其在湖南零陵地区“向各地的农民宣传,动员他们交公粮”的场景:“刚解放时的湘南山区文娱活动极度稀缺,即使有点什么演出,也是地方戏或流浪艺人的表演,歌剧和苏联歌曲、舞蹈绝对是头回见识,那种新鲜感就不用提了。”<sup>⑦</sup>为配合征粮工作,贵州江口县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时任军政工作代表团团员的冀鲁豫南下干部王志祥观察说:“从北方老解放区来的同志,许多人都是扭秧歌的里手。什么‘大翻身’、‘小翻身’,动作活泼大方,扭起来十分好看,而且扭的花样很多,连踩高跷也扭秧歌,加上一些化装后的滑稽动作表演,真令人捧腹大笑,扭秧歌深受大家的喜爱。”<sup>⑧</sup>藉由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歌剧、秧歌等新型文化娱乐活动相继进入南方新区,从而进一步引发了乡村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

① 单志远:《炉山县的农民运动》,中共荏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荏(博)平南下北上干部》,第262页。

② 中共白云区委党史研究室:《贵筑县白云区“五大任务”的完成及其影响》,中共贵阳市白云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白云党史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1991年印,第59页。

③ 《徐运北同志传达华东局指示精神》(1949年7月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菏泽市委员会编:《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综合卷》,第186页。

④ 刘晓晔:《衡山的农民》,《人民日报》1950年3月31日,第2版。

⑤ 武彦荣:《难忘的岁月,伟大的人民——南平县解放头三年的一段粗略回顾》,襄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血丹心:“长江支队”襄垣籍南下干部回忆录》,内部资料2012年印,第205页。

⑥ 《中共衡阳市委关于衡阳市征收工作初步检查的报告》(1949年11月30日),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69页。

⑦ 吕纯:《从吕庄到长沙——南下干部吕纯九十自述》,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126页。

⑧ 王志祥:《解放初期的文艺宣传工作》,江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口县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印,第101页。

## 结 语

因应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赓续干部抽调的既有经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南下”战略应运而生，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南方新区社会改造任务遂由华北南下干部所承担。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征粮工作向来构成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实践的载体与引擎，这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品格之使然，另一方面亦缘于征粮工作在调整社会结构、变革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后，粮食是党和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然囿于资源禀赋、政权更替及南北差异等因素，华北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面临着诸多困境。在这一承续多方挑战和诸多考验的历史实践中，华北南下干部成功将征粮工作与乡村社会改造有机统合起来，这一统合既是革命政策嵌入的结果，同时又是革命实践调适的产物，并展现出超越时空轨迹的革命承续性特质与历史连续性特征。在政策嵌入与实践调适的双重逻辑下，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最大限度实现了乡村社会改造的目标，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乡村发展路向的崭新社会情境由此开始生成。历史演进的客观进程表明，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蕴，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改造效应，其并非只是为兹后开展的剿匪斗争、土地改革等较为显性的社会改造实践提供了物质前提，而是共同打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方新区乡村社会改造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不仅稀释乃至消解了南方新区的征粮工作、剿匪斗争和土地改革等在致因呈现、时序运作及推展梯度等方面的扞格与抵牾，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实践从北方向南方扩展、从老区到新区转移的一种典型示例。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陈佳]

### 《党的文献》2024年第2期要目

“第二个结合”中蕴含的若干中华文化观念	曹应旺
当前国内新质生产力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董振瑞 李臻
习近平关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要论述的五维阐释	王章豹 杨寻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科学思维方法	黄寿松 贺冬冬
《任弼时论党的建设》新公布文献一组	
“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	
——《任弼时论党的建设》新公布文献简述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毛泽东对大党建设问题的探索及其经验启示	毛胜
刘少奇对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积极探索	刘肖委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活动纪事	熊华源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	茅文婷
大生产运动中抗日根据地的“按家计划”	俞小和 吴石英
在华欧洲人士眼中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德明